

党建统领推动基础教育资源扩优提质

□ 李毓强 刘勇

习近平总书记任山西考察时强调,要“强化‘一老一小’等重点民生保障服务”。基础教育作为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基础性工程,推动基础教育资源扩优提质,是保障“一老一小”民生服务的关键所在和重要抓手。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明确提出,“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民生工作的各领域全过程”,并部署开展“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凸显了党在教育资源战略配置中的核心地位。以党建统领推动基础教育资源扩优提质,既是落实教育强国战略的政治要求,也是破解基础教育发展瓶颈的实践路径。

突出战略引领,构建扩优提质系统框架。建设教育强国,重点在基础教育。一是强化顶层设计,构建全域统筹资源配置体系。坚持党对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战略引领,市级层面要统筹政策制定,将基础教育优质资源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建立“人口变化—产业布局—学位供给”的动态响应机制,实现教育资源与人口发展、城市建设、产业布局协同推进;区县层面要统筹基础教育资源规划布局的落实,在

城市建设中,严格落实“学校建设与城市发展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的要求,针对人口流入集中的城区、城市新区,足额规划学校建设,确保学位供给与人口增长相匹配。二是聚焦公平导向,完善优质资源均衡配置机制。要充分发挥党在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中的领导核心作用,着力缩小城乡、区域、校际差距。在资源配置上建立“三个倾斜”机制,向农村地区倾斜,加大对农村学校的经费投入、设施建设和师资补充力度,切实改善办学条件;向薄弱学校倾斜,通过“一校一策”制定改造提升计划,推动优质学校与薄弱学校结对帮扶,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向特殊群体倾斜,针对留守儿童、随迁子女、残疾儿童等群体,完善入学保障、生活资助、学业辅导、心理关爱等精准服务体系,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公平优质的教育。三是健全质量标准,推动资源建设实现内涵式发展。科学且完善的质量标准是推动基础教育资源扩优提质的重要保障。要出台覆盖硬件设施、课程教材、数字资源等关键领域的建设标准,并根据时代发展和教育需求对这些标准实施动态更新,明确资源建设的功能要求、技术指标与育人导向,确保资源配置的针对性和普适性,既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学生的个性化需

求,又让每一个受教育者都能从优质的教育资源中受益。

突出组织统筹,激活资源整合协同效应。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应运用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的系统观念进行顶层设计,多层级协同发力、扎实推进。一是强化组织统筹,建立多元协同机制。各级党组织要充分发挥组织优势,为教育资源整合提供核心保障。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统筹解决土地划拨、教师编制、经费保障等系统性问题。打破校际与区域壁垒,以党建为引领建立“教育资源共同体”,通过集团化办学、教共体等形式,推动优质课程、师资力量、管理经验等要素流动,让优质资源从“单点突破”向“集群发展”转变。二是立足创新驱动,构建资源共享格局。数字技术是打破资源壁垒的关键支撑,各级党组织要引领基础教育资源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打造覆盖全学段的数字化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集成优质课程库、智慧教研系统与学习分析工具,夯实资源共享底座,实现资源的精准推送与跨区域、跨校际共享。要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与教育资源深度融合,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开发沉浸式实践课程,以技术创新破解资源均衡与质量提升的双

重难题,通过学习分析系统生成个性化学习资源包,为学生提供定制化教育服务。三是强化队伍建设,完善师资流动体系。教师队伍是教育资源转化的核心载体,区县党委要通过建章立制,构建城乡师资一体化流动机制,深化“县管校聘”改革,建立教师编制周转池等制度,从职称评定、评优评先、待遇保障等方面着手建立激励机制,推动优秀校长、骨干教师向农村学校、薄弱学校流动。学校党委要以集团化办学、学区化治理为抓手,定期组织内部教师培训和交流活动,强化师资互派,让优秀教师成为集团内或学区内流动的“活资源”,带动薄弱学校提升办学水平。

突出育人导向,提升资源供给使用效益。推动基础教育资源扩优提质,要聚焦育人核心。一是坚持立德树人,落实五育并举。学校党组织要引领基础教育资源回归育人本质,完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德育资源供给,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发沉浸式实践课程,通过常态化学习平台推送德育资源。优化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智育资源供给,减少机械训练类作业,增加探究式、项目式学习资源与跨学科融合课程,建立基于真实问题的实践资源库。强化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资源保

障,配齐配强专业教师与设施设备,整合社会资源拓展实践场景,确保开齐开足体美劳课程,形成“五育融合”的资源供给格局。二是创新资源管理,提升使用效益。各级党组织要创新资源管理方式,通过实时采集教室、实验室、图书馆、运动场等资源的使用频次、闲置时长等数据,建立起基于大数据的“需求导向、动态调整”的调配机制,依据实际需求对资源进行动态调整配置,将资源相对富足学段的设施设备向其他学段学校开放共享,延长资源使用链条;将社会教育资源在教学期间向学校开放,学校资源在放学后、假期等时段向社会开放,拓展资源使用的广度,实现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三是优化评价机制,注重育人实效。评价是推动教育资源不断优化的重要动力,要建立以育人质量为核心的资源效能评估机制,引导资源配置向提升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聚焦。完善“投入—产出—成效”三维绩效评价体系,将资源使用效益纳入学校党建工作考核,改变过去单纯以升学率、硬件设施等指标衡量学校办学水平的做法,建立更加科学、全面的评价体系。

(作者单位: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市教科院分中心)

乡村振兴战略下重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机遇与挑战

□ 张季楠 刘世曦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部署,其有效实施亟需高素质人才的持续供给与创新驱动。作为西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枢纽,重庆市“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独特结构使其面临人才流失、产业空心化等现实挑战,亟需高校通过创新创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东部发达地区高校的产教融合模式,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如重庆)的实践探索关注不足,且普遍存在“重技术轻文化”“重城市轻乡村”的路径偏差。例如,邹金町(2023)指出,当前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在文化传承与市场需求匹配方面存在显著脱节,而李童(2024)则强调城乡知识权力结构的不对称性进一步加剧了政策落地困难。

重庆高校在乡村振兴中承担着“人才补给站”与“文化枢纽”的双重角色,但其创新创业教育仍面临资源整合低效、城乡协同断裂等瓶颈。例如,某高校“智慧养殖”项目因忽视农户参与而失败,凸显了单向技术输出模式的局限性。

产教融合理论经历了从单一校企合作到

系统性协同创新的范式转变。早期的校企合作模式聚焦于技能适配性,例如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强调企业与学校的供需对接。随着产业升级需求加剧,Etzkowitz提出的三螺旋模型(Triple Helix Model)成为主流框架,主张“高校政府企业”三方协同创新,推动知识生产与产业应用深度融合。然而,该模型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存在显著局限性:其一,忽视乡村社群作为利益主体的能动性,导致政策执行与在地需求脱节;其二,过度依赖技术驱动,缺乏对文化资本作用的考量。例如,重庆某高校“智慧养殖”项目因缺乏农户参与而失败,凸显了单向技术输出模式的缺陷。

东西部高校的产教融合路径呈现显著分化。东部地区依托经济优势与产业链完整性,形成“产业主导型”模式。例如,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与华为共建ICT学院,技术转化效率较高。而西部高校(如遵义职业技术学院)受限于资源约束,更多采用“政策驱动型”路径,依赖政府专项资金支持,但项目盈利性不

足(仅32%)。研究指出,西部高校面临校企合作机制僵化、企业参与度低等结构性障碍,导致协同创新能力受限。例如,重庆高校的校企合作频次与乡村GDP增长率仅呈弱相关($r=0.21$),表明资源整合效率低下。

尽管政府通过专项资金(如重庆“乡村振兴试验区”政策)大力支持高校创新创业,但执行中暴露两大矛盾:逆向选择:部分高校为获取资金“包装”项目,忽视市场需求评估(如某“区块链+农业”项目缺乏应用场景);考核导向偏差:政策评价侧重“投入规模”而非“产出效益”,导致重建轻运营。这与“创新驱动要素的非对称性关系”结论一致,表明政策设计需从“输血式”转向“绩效导向型”。

城乡知识权力的不对称性导致技术主导型项目(如重庆某高校“智慧养殖”)失败。农户对复杂技术的排斥(78%认为操作困难)与高校“技术至上”思维形成冲突,印证了杜丹(2024)提出的“四重融合缺失”问题。相比之下,文化资本驱动型项目(如“非遗工坊”)通过乡土知识嵌入,实现了权力结构平衡,验证

了“乡村社群赋权”的必要性。

本研究通过定性定量研究方法,系统分析了乡村振兴战略下重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机遇与挑战。理论层面,提出“四螺旋模型”与“需求资源制度”匹配框架,突破传统产教融合的“技术中心主义”局限,强调乡村社群的主体性与文化资本价值。实践层面,揭示政策支持与项目盈利性悖论(85%资金覆盖率vs.32%盈利率)的根源在于资源错配与执行偏差,并通过“非遗工坊”等案例验证文化协同的有效性。针对重庆“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特殊性,提出“乡村创客”微专业课程与土地流转创新等对策,为西部欠发达地区提供可操作方案。然而,研究受限于地域样本与数据时效性,未来需拓展至成渝双城经济圈对比分析,并探索数字化工具在文化资本转化中的深度应用。本研究不仅为城乡协同创新理论注入新视角,更为政策制定者与教育机构提供了实践指南,助力乡村振兴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融合。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影视电影学院)

红色基因如何嵌入双创教育

□ 张季楠 刘世曦

年轻群体的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肖红军,2023)。例如,哈尔滨师范大学“红色基因辅导员名师工作室”通过校地共建“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基地”,将高校红色育人资源下沉至中小学,结合“移动思政课”等形式,激活红色文化符号的当代教育价值(刘倩,2025)。此类实践表明,红色基因的文化资本属性能够有效转化为教育场景中的价值引导工具,但其转化效率高度依赖情境化设计(如AI技术重现历史故事)与多学科衔接机制。

尽管红色基因的教育功能被广泛认可,但其与创新创业的兼容性仍存争议。部分学者认为,红色教育的“历史导向”与双创的“未来导向”存在张力,可能导致资源整合低效。例如,陕西高校在红色文创开发中面临“传承实效性不足”的挑战,反映出符号转化能力的缺失。然而,实证案例显示,通过情境化实践(如“直播认养+云养鸡”模式)可将红色资源与现代商业模式结合,提升经济附加值。这一争议的核心在于红色基因能否突破传统叙事框架,实现“历史性”与“创新性”的动态平衡。

国内外校地协同模式呈现显著差异。以美国“硅谷模式”为例,其核心是市场驱动的技术转化与风险投资支持,强调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合作。相比之下,中国“红色赛道”更依赖政策驱

动与文化嵌入,如“青年红色筑梦之旅”通过政府主导的校地结对服务,推动红色资源向双创教育资源转化(魏勇,2024)。东台市通过“红色镇村优先发展工程”,整合市直部门与农业专家资源,形成“需求对接—课程共建—孵化反哺”的闭环路径,体现了政策与文化的双重驱动。

当前校地协同的主要瓶颈包括资源匹配低效与利益分配失衡。《高校课堂双创教育生态体系与长效机制探索研究》(2024)定量研究表明,企业在协同中的“知识产权归属不清晰”达45%,凸显利益博弈的复杂性。例如,江西理工大学“四二一”模式通过“全链条孵化”缓解资源分散问题,但政策激励(如税收优惠)的可持续性仍需制度保障(顾东平,2025)。此外,文化符号转化能力不足导致红色资源难以融入双创课程体系,进一步加剧协同难度。

本研究通过“红色基因—双创教育”的嵌入机制,扩展了传统双创理论边界。已有文献侧重于主体协同(高校、政府、企业)的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但多忽视文化要素在协同中的润滑作用。例如,郑季良等(2022)提出协同创新的核心是知识增值与制度设计,但其对文化符号转化的分析不足。而本研究通过案例发现,红色基因作为文化资本,

通过情境化实践(如沉浸式研学、AI技术重现历史)显著提升了校地协同的黏合度,验证了文化嵌入对协同效率的促进作用。这一发现弥补了协同创新理论在文化维度上的空白,呼应了哈吉(1973)提出的“协同效应需通过子系统互动实现”的经典观点。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知识通过情境化互动主动建构,但既有研究多聚焦传统学科教学(如高中英语、科学课堂),鲜少关注其在双创教育中的应用。本研究发现,“青年红色筑梦之旅”中的项目路演与企业调研(如江西理工大学“四二一”模式)通过“实践—反思—迭代”过程,有效促进学生对红色精神的内化与创新能力的外显。例如,学生通过红色文创开发项目(如“军神鞋”品牌设计),将历史叙事转化为商业价值,验证了建构主义“知识通过实践生成”的核心假设。这一结果与Zhou J. & Li X. (2022)提出的“数字化教育需融合真实与虚拟情境”观点形成互补。

红色基因与双创教育的融合本质是通过情境化实践将精神符号转化为创新资本。校地协同需以动态三螺旋破解目标周期撕裂,并以弹性化路径实现“文化深耕”与“实践敏捷”的平衡,为教育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中国方案。(作者单位:重庆大学影视电影学院)

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 王燕 彭泽平

教育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具有基础性作用,是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基础支撑与先导力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第五章指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这为深入推动教育领域深层次变革,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要以培养更高素质的劳动者、助力更高水平的科技创新、推动新兴产业发展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探寻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可行路径,更好地服务高质量发展。

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赋能高素质劳动者培养。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亟须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培养具备创新能力和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的高素质人才,进一步有效供给。一是建立健全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深化招生考试和学业评价改革,打破“唯分数论”的传统选拔模式,构建以创新能力为导向的学生综合评价体系。紧跟全球科技前沿和产业发展趋势,围绕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新增或迭代升级相关专业,构建与新质生产力适配的学科专业集群。二是积极探索交叉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打破传统学科壁垒,鼓励高校开设辅修专业、微专业和跨学科证书项目,推广本硕博贯通培养机制,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提升综合能力。加快推进学分制、导师制和书院制改革,赋予学生更多自主学习权和课程选择权,促进个性化发展。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支持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开发、教材编写及实训基地建设;创新校企合作机制,探索建立产业教师、企业导师与学校教师共同授课和指导的“双师型”教学团队,促进教育链与产业链有机衔接。

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赋能高水平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高校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结合起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支撑。一是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方式。推动更多资源投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前沿科学研究和未来产业培育领域;完善“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的科技资源投入机制,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共性技术研发。二是深化科研院所改革。支持高校与科研机构、领军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工程技中心和研究院,围绕重点领域组织开展跨学科、大协作、高强度的科技攻关,提升原创性、引领性的科技突破能力。加快推进科研组织模式改革,打破机构壁垒与学科界限,构建跨学科、跨院校的协同攻关机制。三是推动高校科研评价改革。深化职称评审和绩效考核改革,建立分类评价体系,突出创新价值和实际贡献。加快破除“五唯”倾向,建立健全以质量、贡献和实效为导向的科研评价机制,强化对重大原始创新、关键技术突破和高价值专利培育的激励,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充分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

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赋能新兴产业发展。新兴产业的蓬勃兴起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体现,教育综合改革要紧密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和未来发展培育的需要,优化教育供给结构,增强服务新兴产业发展的能力。一是增强学科专业建设的前瞻性和响应速度。深化学科专业设置改革,建立快速响应产业需求的审批机制和退出机制。重点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等未来产业方向,超前布局一批新兴交叉学科专业,形成支撑产业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二是创新产学研协同机制。深化产学研合作机制改革,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长效合作机制。鼓励高校与行业龙头企业共建现代产业学院、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等新型协同体,共同开展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产品创新和人才培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化、产业化的创新链条。三是完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转移转化机制。培育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和人才队伍,构建涵盖知识产权管理、成果推介、中介服务与股权激励的全链条转化服务体系,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制度改革,完善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和收益分配机制,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作者单位分别为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西南大学)

在新时代“文化自信”与“双创教育”双轮驱动的政策背景下,红色基因传承与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已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实践方向。一方面,国家相继出台《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明确提出“双创教育需融入家国情怀”与“红色文化赋能教育创新”的要求;另一方面,当前双创教育存在“重技能轻价值观”的倾向,商业化导向过强导致学生社会责任意识薄弱,而红色教育则面临形式化、单向灌输的困境,难以与青年群体的认知特点有效衔接(李毓,2024)。在此背景下,“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作为教育部主导的实践平台,通过校地协同机制推动红色资源向双创教育资源转化,成为破解上述难题的关键突破口。例如,闽江学院联合多校开展“红色基因课程思政联展”,哈尔滨师范大学通过“校地共建”打造移动思政课堂,均体现了红色基因与教育创新的深度融合潜力。

红色基因作为红色文化的核心载体,其教育功能主要体现在价值观念塑造与社会认同构建上(俞森,2023)。学者研究指出,红色基因通过历史叙事、符号化实践(如红色研学、沉浸式展览)和制度化课程设计,能够强化青

“四力”融合推动市域产教联合体实体化运行

□ 卓娅 伏建平

力。制定完善市域产教联合体章程、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构建专兼职人员聘用及评价体系,绩效考核体系、运营质量保障体系。建立密切配合的协调联动机制,促进多方信息与资源共享,确保以协作治理为导向的产教联合体顺利运行,提升各方参与建设和治理的积极性。

强化激励支持,增强企业积极参与的吸引力。真正破解产教融合“校热企冷”“合而不融,融而不深”等难题,是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关键环节。长期以来,企业与职业院校的合作往往停留在实习实训、就业服务等浅表层面,缺乏在人才培养方案共研、课程教材共建等方面的深度合作。因此,要高度重视产教联合体内部不同主体的差异化诉求,加强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吸引企业参与学校办学,完善校企合作育人成本分担机制,确保企业利益得到合理补偿。瞄准产业需求,靶向企业诉求,精心编制产教融合激励政策实施细则,清晰界定企业参与的条件与奖励标准,增强政策实操性。同时,政府应对现有的“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组合式产教融合激励政策进行细化落实,制定出台更多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土地租赁、信贷支持等

操作细则,切实减轻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经济负担。

创新培养模式,激发学校主动作为的执行力。职业院校作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主阵地,承担着提升办学能力,提高办学质量的重要使命。职业院校要以产教联合体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专业、课程、教学、实习实训等关键办学要素改革,及时把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引入教育教学实践。要“围绕产业建专业”,结合园区的产业发展规划,建立学校专业设置与园区产业协调联动机制,服务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确定市域产教联合体重点建设专业清单、改造升级专业清单、限制撤销专业清单,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高效匹配。围绕“理实一体化”建课程,聚焦园区企业生产流程与任务,对接职业标准和岗位规范,梳理生产环节技术要求、工序流程、典型职业能力等,重构课程体系、重组教学内容,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探索建立职业院校教师与企业高技能人才、“工匠大师”的双向聘用机制,推进企业人员“互兼互聘”。注重“工学结合”开展实习实训,在产教联合体内建设一批公共实训中心,为产教联合体成

员单位的学生、职工、科研人员提供实践教学、社会培训、技术服务,有效推动教学过程与生产流程、科学研究的深度融合。

完善内部治理,形成各方权责明晰的约束力。市域产教联合体内部包括地方政府、产业园区、企业、职业院校、科研机构等多个单位,既是利益共同体,更是责任共同体。为避免相关各方在实际运行中因权责划分不清,出现“联而不合”的问题,市域产教联合体应坚持因地制宜,按照“一市一策”“一体一案”原则,建立“理事会、秘书处、职业经理人”等实体化运营机构,明确各成员单位的任务分工、职责和权利,畅通利益诉求表达渠道。要强化制度约束,完善以章程为根本、以目标为导向、以评价为手段的沟通、协调、奖惩、退出机制,对任务完成好、社会评价高、绩效考核成绩突出的成员单位在品牌推广、经济效益分配等方面予以倾斜支持,对不积极贡献智慧、应付式参与、损害联合体共同利益的成员单位要及时清退,并重新吸纳有参与意愿和能力的成员单位加入,为推动产教融合走深走实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

(作者单位分别为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重庆市教育委员会)